

寶玉和順治皇帝——清初的政治、宗教和文學

柳存仁

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

在1992年的秋天，我因為到揚州去出席關於《紅樓夢》的國際研討會，曾寫過一篇〈紅樓夢之舊本〉的文章，裏面大概是說我很懷疑，恐怕曹雪芹的《紅樓夢》是根據一個舊本，不過他把它改寫了，成為幾乎是完全是創作的劃時代的作品。不過書裏舊本的痕迹還是有的，因為在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偉元的木刻活字本一百二十回出現以前，《紅樓夢》的前八十回還在傳抄流通的時期，現存各種早期的鈔本（甲戌、己卯、庚辰、戚蓼生序本之類），根據的都是仍在改動中未完成的底本，它們只有八十回，而八十回裏卻有些文字，為後出的程本所不載。這些鈔本裏，往往看到一些或在書頭、或在夾行間注上所謂「脂評」（脂硯齋或別的署名）的文字，這些文字便成為後人研究作者曹雪芹的身世的好資料。¹

從十八世紀末到民國初年，研究《紅樓夢》就有索隱說和自傳說兩個派別。在清代的那個階段索隱派的研究是不很嚴肅的，有些只是hearsay，沒有系統的，可以說是筆記、茶餘酒後的意見。這些意見和有關的資料現在幾乎全收在一粟（周紹良、朱南銑）編的兩冊《紅樓夢卷》裏了。² 蔡元培先生在民國五年（1916）發表的《石頭記索隱》是比較有鮮明的立場的，他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³ 這話也許有一部分是對的，但是蔡先生提的意見，自己說還是為清代陳康祺的《郎潛二筆》中所記陳的老師徐柳泉（時棟）說的話所引起的。那些零碎的意見，其實多是片面的比附，不能夠具體地支持蔡先生的主張。五十年代的潘重規先生作《紅樓夢新解》，⁴ 他就完全接受了蔡先生的民族主義的

¹ 拙文收在《紅樓夢學刊》（北京）1993年第一期（1993年2月），頁43-65；及第二期（1993年5月），頁137-64；也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臺北）第三期（1993年），頁55-100。

² 《紅樓夢卷》（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1965年）。《紅樓夢卷》還很有系統地收了許多有關的語詞、序跋和評論文字，還有些專書的摘要。

³ 這書有臺北廣文書局1980年的重印本（引文見頁1），是影印原書1922年的第六版。

⁴ 這書是1959年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的，近年臺北的三民書局曾重印。

看法，卻不同意蔡先生所學的那些康熙間滿清政治人物的事迹是證據。但是潘先生的看法，仍有很多地方可以說是跟蔡先生息息相通的，例如他以爲寶玉就是象徵的玉璽；寶玉喜歡胭脂，愛吃女子口上的紅，紅就是指的朱紅，也就是明朝。《紅樓夢》第十九回襲人對寶玉說他「又說除『明明德』外無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句話本出《禮記·大學》，也見《四書》；潘先生說這也是暗示教人思念明朝的。潘先生之後，七十、八十年代索隱派的新著，還有杜世傑、李知其等人的書，有的是私人發行的非賣品。⁵ 李先生做的功夫很細，但像他自己說的，主要的只是猜謎。不過，像我下文所說的，他的那種「猜謎」，雖然大多數是很隨意的、不可靠的，也偶有射獵得對的地方。

從民國十年（1921）11月胡適之先生寫定他的〈紅樓夢考證〉⁶ 的時候起直到今天，七十多年來研究《紅樓夢》的自傳說一派是佔了很熱烈的上風的。五四時期的俞平伯、顧頡剛，後來居上的周汝昌、馮其庸、趙岡、周策縱……，數也數不清的學者，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研究曹雪芹的個人和環境家世的書籍和文字，真地汗牛充棟，真地像余英時先生說的紅學等於是曹學了！（實際上中國國內真有《曹學論叢》這樣的刊物。）曹學的好處我們這裏簡單地只舉幾個例：《紅樓夢》五十四回賈母看家裏的戲班演戲，指著史湘雲說，自己像湘雲那麼大的時候，家裏有一班小戲。有個彈琴的，能彈《續琵琶記》的〈胡笳十八拍〉。《續琵琶記》根據劉廷璣的《在園雜誌》卷三、蕭爽《永憲錄·續編》這些著作，我們知道正是雪芹的祖父曹寅作的，〈胡笳十八拍〉是《續琵琶記》的第二十七齣〈製拍〉，這是曹家的家乘。又像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前托個夢給鳳姐，說「我們家裏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旦樂極生悲，不要應了「樹倒猢猻散」那句俗語。「樹倒猢猻散」這句俗語，至少南宋時已經流行了，但是脂硯齋評語的眉批說：「『樹倒猢猻散』之語，言猶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傷哉！」表示這句話寫評的人會經常聽到過。周汝昌先生引了清初施璲的《隨村先生遺集》卷六〈病中雜賦〉的原注，原來這句話是曹寅生前的口頭禪。⁷

自傳派的學者們做的考證，也許不是時時都是這樣證據確鑿的，不過客觀的考證，總比猜謎要接近真實些。我們不妨試一試用自傳派推崇的考證手段，去檢查一下索隱派的是非，卻仍不否認索隱的客觀的可能性，我想這樣做法或者是可行的。譬如說，民國二年（1913）出版王夢阮、沈瓶庵著的《紅樓夢索隱》主張第二十五回〈魘魔法叔嫂逢五鬼〉是指影射康熙的太子允礽被大阿哥允禔用蒙古喇嘛巴漢格隆等咒詛以致瘋狂；又說第三十三回賈政笞撻寶玉是指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布爾哈蘇臺廢太子允礽的事

⁵ 杜先生著《紅樓夢悲金悼玉實錄》（臺中：蘭燈出版社，1971年）；《紅樓夢原理》（臺北，自印本，1972年）。李先生著《紅樓夢謎》（二冊，香港，自印非賣品，1984-1985年）。

⁶ 《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重印本），第一集，卷三。

⁷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頁464。

情；蔡先生的《索隱》對這兩事的看法也跟他們的一樣。⁸ 我檢查一下《清實錄》，發現王、沈兩位的《索隱》說寶玉養傷三十三天就是「允礽被幽四十四日」，「允礽開釋後居咸安宮」，他們說的這兩句話都和《實錄》的記載不符合。允礽被幽囚的時間並不止四十四日，咸安宮正是他被囚的地方而不是釋放後住入的地方。時間、地點全不一樣，這種附會似是而非的推測，就顯得漫無根據了！

如我上面所舉的例，似乎索隱派像是沒有什麼可取的了。不，不，我說的並不是那個意思。事實上我以為索隱的功夫仍是可以做、值得做的，不過我們應該謹慎，要腳踏實地，才不會虛落懸空。為什麼索隱對許多研究的人或讀者也還有些吸引的魅力呢？好奇是人的本性，而《石頭記》，又叫做《情僧錄》，又題做《風月寶鑑》，這都是見於各本皆同的第一回原文的。⁹ 原文下面還說，「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做《金陵十二釵》。這種奇怪的敘述，不能不教人注意。我在上文說今天流傳下來的各鈔本它們根據的是「仍在改動中未完成的底本」大概不能算是荒謬的了！那麼，我們即使用了較鈔本遲的活字本「程甲本」，即使不是專門做研究，但用常識來判斷，這最遲的本子《紅樓夢》也還可以發現它留下了不少難解的地方。第二回講榮國公的兒子叫做賈代善，代善兩子，叫做賈赦、賈政，赦和政都是在小說裏出現活躍的人物。我們同時又看到第一回的回目寫的是「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這「甄士隱」、「賈雨村」，在從前研究《紅樓夢》止於茶餘酒後議論的時代，已經有人看得出來說的是把「真事隱去」，說「假語村言」了。這樣的猜謎即使主張自傳說的前輩胡適之先生也會同意，說這書是「『將真事隱去』的自敘」，¹⁰ 那麼我們何不試試把審查的尺度再放寬一點，懷疑賈赦、賈政的「赦」、「政」二字，也許就是從清初多爾袞做的攝政王的頭銜移用過來的呢？一個人的私名稱做「政」的，大約也還容易找得到，單名叫做「赦」的，好像一出世就希望犯罪被赦免，這就是在傳統社會裏，大概也很少的罷？「賈赦」、「賈政」很明顯地是「假攝政」，是詆毀清初滿洲入關後統治中國的話，我們這樣說似乎也不能算得太敏感。赦、政他們倆的父親叫代善，這代善還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二個兒子的名字，他是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個兒子多爾袞的不同母親的哥哥。當然，這些名字全是譯音。代善這名字這樣出現，真是很可訝的。

不過，如果說《紅樓夢》裏隱藏著一些反清的訊息，我們又會立刻遇到了幾個難

⁸ 蔡著《石頭記索隱》，頁21；王夢阮等著《紅樓夢索隱》（臺北：臺灣中華書局重印，1964年），第一冊，卷五，頁61-62；第二冊，卷七，頁32。

⁹ 甲戌本在《情僧錄》句下多了「至吳玉峯題了《紅樓夢》」一句。關於這種彙校的問題，可看馮其庸（主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彙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這書共參用了十一種本子。

¹⁰ 〈紅樓夢考證〉，頁607。

題。第一，我們承認自傳說的許多學者的發現，這部書裏有若干曹寅到曹雪芹家世和生活變遷的大小事迹，說它是將真事隱去的自敘在某一個程度上來說不能說是謬誤。第二，以曹家煊赫熱鬧的富貴環境和雪芹的祖父曹寅和康熙皇帝的關係，即使在家道中落的貧窮時候，雪芹的頭腦離開反清也還會有一大段的距離，那些反清的文字照理不應該在他的書裏發現。第三，這些不應該發現的材料竟然在他的書裏出現了。我們要揣測這些問題，必須把這幾方面都能夠顧慮到，才能比較有多一點的希望接近事實。

清初的時候滿、漢之間，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關係很緊張，是大家早已知道了的。反滿的漢人要想互相通音訊聯絡，或是自己發抒內心的真實情感，在文字上就得格外地謹慎。明末時候的詩人文士本來有一個流行的習慣，就是把一些特定的名字精妙地隱藏在描寫景物的詞句裏。比這更嚴密的，還有人把違礙的特殊字眼，看它在《廣韻》裏屬於什麼聲什麼韻目，就用和它同聲的上一個韻目來代替。例如要說「滅虜須名將，尊王仗列侯」，「虜」字是犯忌諱的，這個字本屬上聲「十姥」，就用「九囊」這個韻目字來代替，這樣就成了「滅囊須名將」這句不易明白的暗話了。這是顧亭林（炎武）作的隱晦的詩裏常用的技倆。但是即使這樣，亭林的詩也還是鈔本，初刻的公開的詩集就有很多的闕文。¹¹ 現在我們看《紅樓夢》的隱語，像前面講過的「賈赦」、「賈政」之類，那比這種文雅的暗話實在大膽多了，何況我們還可以從《紅樓夢》舉一些更反常、更難解釋的例證：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寶玉把家裏戲班的女孩子芳官改個男名，叫做雄奴，是諧匈奴的音的。這已經很怪異了。不料下文寶玉更說：

既這等再起個番名，叫耶律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國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僭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俛，緣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

這些話庚辰、己卯、戚序這些鈔本都還保留，可是程甲本就把它刪掉了。

像這樣文字上十分可疑的，我從前寫過的〈紅樓夢之舊本〉長文裏，也曾舉過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紅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膾〉做個可以懷疑的另一個例子。那可疑的地方不但是在這一回裏說「史湘雲故意裝出一個小騷達子來」，並且那吃腥膻的地方還叫做蘆雪庵，這個庵字也許有可能是庭字。傳統的文字裏常常用虜庭去代表外族的朝廷，腥膻在文學作品裏又是說北方胡族身上的一股強烈的羊臊氣味。剛才我引六十三回說，「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現在這一回又有黛玉說，「罷了！罷了！今

¹¹ 看潘重規《亭林詩考索》裏收的幾篇文章，這裏引的見〈聞嘯〉（實在是〈聞詔〉）一辭（香港：新亞研究所，1962年，頁5）。

日蘆雪庵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被雲丫頭作踐，就是被小騷達子作踐，這個意思，也許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假如這個蘆庭真地是蘆庭的寄託，那麼，《紅樓夢》更有一些別的地方可能有多少蛛絲馬迹，或者可以尋出它有一個舊本的痕迹。這個舊本和曹雪芹所創造的寶玉、黛玉的愛情韻事的關係可能不大，而是另有一套情節，可惜現在連它的骨幹怎麼樣我們都不知道了。我們所摸索的，都是曹雪芹已經用「畫家烟雲模糊處」（甲戌本第一回眉批）把它沖淡了的東西。如果沒有更多的更好的主證、旁證，即使有人心知其意，這樣的研究終究會是很危險的。專門愛猜謎的李知其先生在他的大著裏認為第五十一回薛寶琴作的十首〈懷古詩〉，〈鍾山懷古〉「名利何曾伴汝身，無端被詔出凡塵；牽連大抵難休絕，莫怨他人嘲笑顏」一首說的是吳梅村（偉業），另一首〈廣陵懷古〉「只緣占得風流號，惹出紛紛口舌多」說的是錢牧齋（謙益），我大體是可以贊同的，因為這也符合我上文所推測的有舊本的看法。¹² 講吳梅村的那首語句很淺白，說的固然合乎吳梅村被迫從南方到北京去做官的經歷。¹³ 另一首的「風流號」，錢謙益本有「風流教主」的雅號，¹⁴ 這就更有紙面上的證據了。然而這些點滴的零星的材料，究竟不成系統，我們要想追求一種新索隱，仍要拿更多的證據來。有多少證據，就說多少的說。

前面引過的王夢阮等的《紅樓夢索隱》，它的〈提要〉說「京師故老」講過《紅樓夢》「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至於董妃，實以漢人冒滿姓，……實則人人皆知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這就引起了後來有不少的人認為《紅樓夢》裏寶玉、黛玉的愛情故事，隱藏的就是順治和董妃的事蹟，而滿洲人董鄂妃就是從南邊劫去的董小宛。¹⁵ 這個故事在歷史上的不真實，孟心史先生（森）七十多年前早在他的〈董小宛考〉¹⁶ 裏很清楚很有力地駁過了。孟先生的駁文，成立了許多年，幾乎沒有人再駁他，直到六十年代（1964）陳寅恪先生寫《柳如是別傳》時，才又附帶地提起了這樁公案。陳先生的看法說董鄂妃當然絕不是董小宛，但是小宛仍然可能是被人劫去，不是病死的，¹⁷ 這句話我們不能不留心。若是說順治皇帝和滿洲人董鄂妃深摯的情分，歷史家孟心史、

¹² 李知其：《紅樓夢謎》，下篇，頁306，308。

¹³ 關於吳梅村的生活，可看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¹⁴ 見冒襄《同人集》卷六張明弼〈冒姬董小宛傳〉中語。

¹⁵ 《紅樓夢索隱·提要》，頁6-12；《紅樓夢卷》，第一冊，頁297-99。

¹⁶ 〈董小宛考〉長文，原刊《小說月報》第六卷第九、十期，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內也轉載過，也收入《心史叢刊》三集和近年重刊的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臺北：南天書局，1987年），頁188-215。《續編》頁208引《同人集》內各篇文字，證明董小宛之死在南方有墳存在，這一段文字為民初發表的原文所無，是孟先生後來增潤的。

¹⁷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冊，頁777。

陳援菴（垣）都做過考證，不過他們並不會注意歷史人物順治皇帝和小說《紅樓夢》裏的虛構人物賈寶玉的關係。這裏面的曲折我們做小說考證的，還似乎有些話可談。

董小宛是明末清初在江南一位著名的歌妓，也就是文化程度很高的妓女。這些妓女她們多數擅歌舞，能詩，善畫，過的是高雅的生活，當然不是僅僅要依附於一個闊人。在不同的時候她們可能被豪貴的客人買去做妾，或是離異了又正式嫁人，或跟喜歡的人同居，但是最好的歸宿自然是找得到一位心愛的有才情的名士。這些名士風流的學人們、官吏們家裏有太太，也許還有側室，但依然要詩酒徵逐，是這個動亂的、但是比較放縱自由的時代的風氣。董小宛的對象是冒襄（辟疆，他和陳貞慧、侯方域、方以智當時稱「四公子」）。他在追求董小宛以前曾經追蹤過陳圓圓，後來和小宛結合，也經過了一段亂離中很辛苦悲淒和危難的遭遇，這些冒辟疆自己有一篇著名的《影梅庵憶語》在《昭代叢書·別集》和一些別的叢書裏都可以找得到，我就不必多說了。《憶語》中說董小宛死於順治八年正月（1651），是因為勞瘁死的。她的年齡比順治皇帝大十五歲；她死後有不少知名的人（像陳維崧其年、吳綺園次、龔鼎孳芝麓、吳偉業梅村）都有文字紀念她，有些人提到葬她的墳地。和年紀大十五歲的人發生戀愛的事雖然較少，這還不是絕對不可能的前提。不過，小宛的決非董鄂妃，是有別的證據可做證明的；但是像寅恪先生說的《影梅庵憶語》曾寫過小宛說她經「夜夢數人強余去，匿之幸脫，其人狺狺不休也」，「可知辟疆亦暗示小宛非真死，實被劫去也」，只說她不知道被什麼人劫去，這也還不是孤證。

在明末清初兵荒馬亂的時期，這種歌妓名女人的被劫的不幸遭遇是很尋常的。冒辟疆尋找陳圓圓不著，是因為圓圓曾經兩次被劫，她是當時朝廷上的貴臣周皇后的父親周奎、田貴妃的父親田弘遇雙方派人用錢用勢爭奪的對象，其間還有假陳圓圓出現的趣劇。¹⁸《虞陽說苑·甲編》收了兩卷《過墟志感》，講常熟的一位寡婦劉三秀被李成棟的兵劫掠，後來清兵來了，又把大批被劫的婦女通通送到南京，聽候家屬尋領。三秀終於順從嫁了給一位統兵的滿洲王爺，書裏沒有這位王爺的名姓，也許指的是博洛。沒有陳圓圓或故事裏的劉三秀那樣標致的婦女，像女詩人黃媛介（皆令），因為面醜，順治二年（1645）在嘉興被劫後居然逃脫。吃了虧好像百口難辯，幸而後來仍然嫁給早年訂婚的楊世功。

寅恪先生學過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十三《東澗詩集》下〈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裏第三十七首律詩，原注說是「和老杜『生長明妃』一首」，其中有「吳殿金釵葬幾回」之句，說這首是詠董小宛的，暗示小宛順治八年正月之死，是假死；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官方發表的董鄂妃之死，才是小宛的真死。所以說她安葬不止一回，否則

¹⁸ 這事也見《影梅庵憶語》。關於陳圓圓，可看陳維崧：《婦人集》，《昭代叢書·己集廣編》（道光本），亦收入《叢書集成初編》；陸次雲：《圓圓傳》，收入張潮：《虞初新志》卷十一；以及鈕琇《觚賸燕巖》內的《圓圓傳》。

錢牧齋這句詩就解釋不通了。¹⁹ 他又舉了吳偉業的《梅村家藏稿》卷二十〈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首〉的最後一首，中有「墓門深更阻侯門」之句，認為「侯門一入深似海」，也表示小宛「亦是被北兵劫去」。²⁰ 我想陳先生的話是有理由的。錢牧齋用漢明妃去比他心目中的小宛，自然是以爲小宛的情狀像是出塞的王昭君。我可以補充這說法再舉一個例：冒辟疆的朋友周士章〈和吳園次八律原韻〉，其中有句云：「咫尺郊南同絕塞，至今青塚不悲王。」孟心史先生引過它，說是指明墓地之所在。²¹ 這個青塚和王，也是說王嬙的。我們想一想，如果董小宛是在南方病死的，她和王昭君又有什麼關連呢！

雖然這樣，但是可能被劫的董小宛依然不是董鄂妃，卻是可以清楚證明的事情。王夢阮等的《紅樓夢索隱》說「董妃實以漢人冒滿姓，……因漢人無入選之例，故僞稱內大臣鄂碩女，姓董鄂氏」，這是大錯的。²² 《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后妃傳〉裏，就在順治一朝的妃嬪裏就有漢女。〈后妃傳〉的恪妃石氏，是「吏部侍郎〔石〕申女。世祖嘗選漢官女備六宮，妃與焉，居永壽宮，康熙六年〔1667〕薨」，就是一個具體的例。順治皇帝的妃子很多，除了皇后、皇貴妃和康熙的母親佟佳氏之外，其他有封號的還有四五個人，還有低級的庶妃。庶妃有子女的有八人，其中大約有一半是漢人。但是說這個後來死時追封「孝獻莊和至德寅仁溫惠端敬皇后」的貴妃董鄂氏是滿人不是漢人，倒是有很多情況需要了解的。原來清朝的皇族跟蒙古的關係十分密切，這是有歷史淵源的，也和統治全域的政策有關係，所以清初的皇后來自蒙古的很多，滿洲公主也多有嫁到蒙古的。順治皇帝的生母孝莊文皇后，後來做了昭聖皇太后，自己就是科爾沁蒙古博爾濟吉特族的公主。在多爾袞攝政的時代，她就把自己的內姪女許給順治，順治八年（1651）冊立爲后。這是順治的頭一個皇后。夫婦意見不合，脾氣、習慣都不很順，順治皇帝費了很大的氣力，開過諸王、貝勒會議，竟然把她廢掉了。可是第二個皇后娶的還是博爾濟吉特氏，而且是太后的姪孫女。這種輩行的差異當時的滿洲人是不管的。〈后妃傳〉說這第二個皇后，「順治十一年〔1654〕五月聘爲妃，六月冊爲后」，但是又說「貴妃董鄂氏方幸，后又不當上指」。這個董鄂氏，就是後來傳說是從南邊被劫來的董小宛，我們細研就知道是不對的了，不過她的來歷也不尋常。

這個時候有一個以客卿地位冷眼觀察朝局和宮裏的這些動靜的人是《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二記載的日耳曼人「約翰·亞當·沙耳，姓方白耳氏」（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華名湯若望的這位兩朝外臣。他是公教耶穌會的神父，他在崇禎三年（1623，太監魏忠賢的勢力猖獗的時代）到了北京，後來幫助徐光啟改良曆法，很得崇

¹⁹ 《柳如是別傳》，中冊，頁776。

²⁰ 同上注，頁776-77。

²¹ 《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篇》，頁208。

²² 第一冊，〈提要〉，頁7。

禎皇帝的欣賞，幾乎教皇帝有接受信仰公教的傾向。據好幾處的記載，崇禎曾經一度命令把宮裏的許多佛像撤出宮外，這就表示他說不定會信天主了。²³ 多爾袞進關，北京換了朝代，對湯若望和他的科學知識也很器重。以後太后和順治對這位現在已經六十多歲的老「瑪法」都很喜歡，讓他做到太僕寺卿、太常寺卿的官，順治還賜他「通玄教師」的法號。在湯若望的《生活回憶錄》裏，他描寫了這個時候的順治是個「肉慾盛旺，性情熱烈」的青年；²⁴ 「肉感的樂趣是他所不能克制的」。²⁵ 他記載這位皇帝「對於一位滿籍軍人之夫人，起了一種火熱愛戀。當這一位軍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時，他竟被對於他這申斥有所聞知的『天子』親手打了個極怪異的耳摑。這位軍人於是乃因怨憤致死，或許竟是自殺而死。皇帝遂即將這位軍人底未亡人收入宮中，封為貴妃」。²⁶ 這位「滿籍軍人之夫人」，就是董鄂妃。她的丈夫就是順治皇帝的異母弟、清太宗的第十一個兒子和碩襄親王博穆博果爾。博穆博果爾是順治十三年（1656）七月三日死的，死的上一年才封的和碩襄親王。他死時才十六歲，生平未必有什麼戰功。《清世祖實錄》裏記的那冊立親王的金冊上僅說「援倣古制，用展親親之誼」，真是極空洞的話。²⁷ 在這一年七、八兩個月間，順治趕著給博穆博果爾造墳建祠；屢次派大臣向他的靈致祭；又冊立董鄂氏為賢妃，冊妃之後又派內大臣鰲拜去向博穆博果爾致祭。八月董鄂氏做了賢妃，到九月就下詔也是「式稽古制」，要立董鄂氏做皇貴妃了！朝鮮這時是清朝的屬國，這一年九月國王李淏（Yi Ho）派他的弟弟李滄（Yi Myo，麟坪大君〔Yinpyung taekun〕）到北京做使臣。這是他第八次進北京了。李滄著有《松溪集》（*Songkye chip*），他的日記〈燕途紀行〉（*Yeonto kihaeng*）收在集內卷七，十月初十日記云：

宮中貴妃一人，曾是軍官之妻也，因慶弔出入禁闈。帝頻私之，其夫則構罪殺之，勒令入宮。年將三十，色亦不美，而寵遇為最。²⁸

美不美是情人眼裏出西施的問題。董鄂妃後來生了個兒子，可惜不過四個月，順治十五年（1658）正月就夭折了。順治皇帝為了鍾愛他的愛妃，又進封這孩子為和碩榮親王，

²³ 參看牟潤孫：〈崇禎之撤像及其信仰〉，載牟潤孫：《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16-26。

²⁴ 魏特（Alfons Vath）（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年），第二冊，頁295。原書名是：*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Missionä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Cologne, 1933)。

²⁵ 同上注，頁307。

²⁶ 同上注，頁323。

²⁷ 《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二，頁二十二上；卷八十九，頁十下至十一上。

²⁸ 《松溪集》（漢城：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所影印，1962年），卷七〈燕途紀行〉下，頁八下（總頁235）。

也爲他建寢園，派官致祭。²⁹ 讀史的人當記得這位只有四個月的小生命的確厲害。安葬他的時候，據說是找老瑪法湯若望來定的日期。後來康熙五年(1666)楊光先這一派和擁護傳統的曆法和回回曆的人上章指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其中的一項罪名是「選擇榮親王葬期誤用〈洪範〉五行」，以致「山向年月俱犯忌殺」，幾乎把湯若望辦成了個凌遲大罪。³⁰ 這是後話了。董鄂妃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冊爲皇貴妃，居然頒詔恩赦。立貴妃這樣大吹大擂的做法是清代歷史唯一的一次。³¹ 順治和董妃兩人甜密的愛情結合大約前後只有五年半的光景，屢次要立她做后，都沒有成功，到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她就病死了。貴妃死後，順治皇帝哀傷逾恆，幾乎瀕於要自殺的危境。我們簡直可以抄襲一句《紅樓夢》第十三回寧國府的媳婦秦可卿死了，寶玉聽見，「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或賈珍「哭的淚人一般」，眾人勸他「且商量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儘我所有罷了！』」我這裏還不是提議說寶玉或賈珍就是影射的順治皇帝，可是如果我們看順治皇帝不但自己撰了一篇〈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行狀〉，說「朕一人撫今追昔，雖不言哀哀自至矣」，又說「朕五中摧痛，益不能不傷痛無已矣」，又特敕大學士金之俊另撰一篇〈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傳〉，申述他悲緒填膺、濡毫哽咽的苦痛。兩文都收在《松鄰叢書》裏。如果把它們檢出一讀，我們就知道就是在凝重的古文的體製中，宮闈的秘辛和順治哀念傷痛的心緒也不曾完全掩藏。³² 〈行述〉裏順治也說及董鄂妃的父親鄂碩和她的哥哥兩人在董鄂妃做了貴妃之後，態度大概都不免有點驕橫。董鄂妃說她父親「有女獲侍至尊，榮寵已極，恐自謂復何懼，所行或不謹，每用憂念」（頁五上）；她哥哥「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脅容有之」（同頁），這也引起她的憂慮。不久她的父兄兩人相繼都死了，她雖難受，倒算是減少了那一方面的顧慮。這恐怕也是實情。假如這個貴妃董氏（〈行狀〉和〈端敬皇后傳〉首句都如此簡稱）是董小宛，她決不會還有這樣的爸爸和哥哥，³³ 更不要提還有一個康熙三十五、

²⁹ 《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一十四，頁十三下至十四上；卷一百一十五，頁二十一下。

³⁰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百七十二，頁10021。

³¹ 看孟森：〈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禮〉，載《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篇》，頁178-87。

³² 〈行狀〉和〈端敬皇后傳〉都收在《松鄰叢書·甲編》，民國七年（1918）仁和吳氏雙照樓刊本。〈行狀〉述及順治所以要廢掉第一個皇后的原因，是因為她嫉刻善妒；他也不喜歡第二個博爾濟吉特氏皇后，〈行狀〉中稱她爲「今后」，說她「秉心淳樸，又乏長才」（頁九上），所以端敬才是理想的伴侶。關於端敬后，還可看張宸的《平圃雜記》（收入《庚辰叢編》）。

³³ 鄂碩棟（董）鄂氏《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一有傳，他就是董鄂妃的爸爸。他有過些軍功。順治六年（1649）「擢鑲白旗滿洲梅勒額真，從鄭親王濟爾哈朗征湖廣。……八年，授巴牙喇囊章京。十三年擢內大臣世職，累進一等精奇尼哈番。十四年，以其女冊封皇貴妃，進三等伯。十四年卒，贈三等侯，諡剛毅。子費揚古，自有傳」。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六年（1696- 1697）大敗噶爾丹（Galdan）的弟弟、撫遠大將軍費揚古（《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一）呢！

《紅樓夢》如果的確有一個舊本，如我們所推測的，這個舊本大約會有董妃的敘述。這個董妃是指的董小宛，但是事實上歷史上真的董妃，則當為董鄂氏。所以關於董鄂妃的愛情故事，在舊本作者的心裏，就會變成了董小宛被擄北上，入宮，以至於年才二十二歲就早殞逝了的哀感頑豔的故事。其實真正的董小宛，假如仍然未死，她也快有四十歲了。獲得了舊本的稿本的曹雪芹，把它徹底地改造，變成了以賈家寧國、榮國兩府的人事變遷做背景，重新創造了寶玉和黛玉的破天荒的大故事。書裏的許多角色所表現的心理刻畫、情節變化、環境結構，都可以說是開闢了前所未見的境界，這簡直可以說是開紀元的大創作。比起這部書的正面貢獻，它所依傍於前人的地方，可以說是微不足道。我們這裏所要尋找的，只是一些它所依傍的影子，希望略存一些這部書的發展的線索和演變的痕迹。

我們要從真正的史料裏去找順治皇帝和董鄂妃的記載，再看舊本的作者和曹雪芹創作如何把這些材料運用在這部書裏面，成為故事的重要部分。

我在上文利用過湯若望《回憶錄》或傳記的材料，下面也還會再利用一點；不過我們也還有佛教方面的資料。在這個時期的人物，不同信仰的活動，常常是不容易共處或互相容忍的，這裏面也關涉到文化背景和更繁複、更迫切的生計問題。湯若望在清初（直到我們現在敘述的時候）大體上還是得到朝廷的好感的，因為據說他曾經用聖牌醫治好了順治的一位未婚的蒙古族皇后的病，所以太后很器重他。³⁴ 湯若望還藉了這個機緣進言，攻擊當時很受宮廷崇奉的喇嘛教。低級的佛教或三教混合的信仰，宮裏的太監們從明代萬曆間以來所辦的經廠，他們刻的許多寶卷和俗經，也是太監的文化活動的一部分。清初順治一朝在建制上大體接受了明宮的太監制度。順治皇帝十四歲親政的時候漢文還一竅不通，連奏章都看不懂，據說許多東西都要靠翻譯。朝廷上的學士們經筵講習恐怕很多都是敷衍的。據順治告訴他所敬服的禪宗大和尚木陳道忞，他學漢文最初靠的是曹化淳，從曹那裏學到了一口倚裏倚氣的山東話。³⁵ 這個曹化淳，就是崇禎時候的司禮監。³⁶ 順治皇帝苦讀，用過八、九年的功，曾經嘔血。陳援菴先生曾舉過他能讀詞賦、古文，他特別欣賞《西廂記》，也知道蘇州有個金聖歎，說他批評的「《西廂》、《水滸傳》，議論儘有遐思」。³⁷ 我想，可惜順治死得早了一點，要不然聖歎

³⁴ 《湯若望傳》，第二冊，頁264。

³⁵ 木陳道忞：《北遊集》卷三〈奏對別記〉上，收入《禪門逸書·續編》（臺北：漢聲出版社影印鈔本，1987年），第十冊，頁48-49。「倚」字原文用「夸」。

³⁶ 參看《明史》卷三百八〈溫體仁傳〉。

³⁷ 陳垣：〈湯若望與木陳忞〉，載《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508-11。

該不會在順治十八年（1661）的「哭廟案」慘死了！³⁸ 順治這個人不論他喜歡遊獵、騎馬，愛好女色，甚至脾氣暴躁，時常鞭打下面侍奉他的人，在許多方面他有他獨立的見解。他同情明末自殺的崇禎皇帝，曾花錢修整他的陵墓，又保藏了八、九十幅崇禎的墨迹。³⁹ 他對隔海對峙的鄭成功也還有怨詞，但是說他初曾投順，後又反叛，對明對清這態度都是不好，所以饒他不得。⁴⁰ 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投降清朝後，順治十二年（1655）他被控通海，就在北京削爵監禁了。但是順治仍說，「收禁在城，亦是沒賬算的人。……打死不如放生，故著人好好養活他」，⁴¹ 這話是真的。順治死後十個月（順治十八年，1661）鄭芝龍和他的家屬才被殺害的。

順治對佛教的禪宗發生興味，大約在順治十四年（1657）他在南苑狩獵，首次走進那裏的海會寺之後。這是一座明代嘉靖間的古刹，現在又謀重修。裏面有上一年剛從南方來的禪師憨璞性聰接待他，談的很投機。憨璞可以說是順治習禪的啟蒙老師。其後他又陸續延請憨璞隔著兩代的長輩玉林通琇和木陳道忞入北京，玉林的弟子苕溪行森也入京，其他的木陳和玉林別的弟子們也多有隨師進京，參預召對的，這在順治一朝的後期可以說是極一時之盛。木陳和玉林都是臨濟宗三十一世，苕溪是他們的法嗣兒子輩，憨璞就是法孫輩了。木陳道忞的《北遊集》記載了很多他和順治間的私人談話，像我在上面所引有些是很大膽的，所以《北遊集》後來在雍正間就遭到皇帝嚴厲的批評，成為禁書。木陳老人在明末就曾熱烈反對過天主教，他自訂的《年譜》⁴² 記他在崇禎八年（1635）就寫過三篇文章大闢「西洋利瑪竇之徒」禍世誣民的謬說。⁴³ 順治皇帝召見他的時候（順治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五月間〔1659-1660〕），問他看過天主教的書籍麼？又自己說：「湯若望曾將進御，朕亦備知其詳，意天下古今荒唐悠謬之說無踰此書。」⁴⁴ 這個時候湯若望雖然剛得了光祿大夫的頭銜，既然「聖眷不隆」，楊光先的《闢邪論》很快也就出現了！

³⁸ 「哭廟案」其實就是發生在順治死後，遺詔發到蘇州，巡撫朱國治也須蒞臨。各處士人乘機集合向巡撫聲訴吳縣縣令的不法。國治偏袒縣令，「於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王應奎：《柳南隨筆》）。這時鄭成功的水軍常進擾江南，士人們暗中通款的不少。當局懼怕，就用嚴刑鎮壓。金聖歎和其他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

³⁹ 《北遊集》，卷三，頁52；卷四，頁74。修崇禎陵寢立碑的事情又可證之於《湯若望傳》，第二冊，頁260。

⁴⁰ 《北遊集》，卷三，頁63。

⁴¹ 同上注，頁64。

⁴² 稱《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影印鈔本亦見《禪門逸書·續編》，第十冊。

⁴³ 同上注，頁194。

⁴⁴ 《北遊集》，卷三，頁60。

我現在嘗試介紹一點《紅樓夢》裏看得到的和順治皇帝有關的資料，雖然不多，每一條都是經過謹慎的考慮的，或有參考的價值：

一、習禪的人都要看前人的語錄，順治也很愛讀語錄，特別是對木陳的老師密雲圓悟的《語錄》，很是關心它的入藏的事情。⁴⁵ 順治的貴妃董鄂妃（端敬皇后），據〈行狀〉說，最初是不信佛教的。經過皇帝的薰陶，「朕以內典、禪宗諭之，且為解《心經》奧義，由是崇敬三寶，栖心禪學，參『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每見朕即舉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參究未能純一。後又舉前語，朕一語答之，遂有省。自嬰疾後，但凭几倚榻，曾未偃臥。及疾漸危，猶究前語不廢提持」。⁴⁶ 可見「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這一句話就是她平常參的話頭。張宸的《平圃雜記》是同時人並且親歷端敬喪事之人的著作，《雜記》說：「端敬皇后喪，……〔上〕命胡〔兆龍〕、王〔熙〕二學士排纂后所著語錄，其事秘，不得而傳。」今天我們既然看不到這個語錄，只好抱著這個話頭，拿它來做審核的標準了。順治皇帝自己當然也應該有相應的表現。《北遊集》裏記載他讀過《楞嚴經》，⁴⁷ 又記「上所居師薨堂，門書『生死事大』，壁書『莫到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⁴⁸ 主張也跟端敬的話頭很相像。《紅樓夢》第二十二回〈聽曲文寶玉悟禪機〉這一回裏又有偈語，又有帶著禪味的〈寄生草〉詞，並且寫得好像寶玉、黛玉、寶釵她們都懂得禪的；但是我們仍然沒有可以鑿實說那些是順治或端敬說過的話。第十九回寶玉對襲人說：「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顧不得」或者也可以說不知道在那兒去安身立命，這話恐怕也隔著一層。「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倒是一口氣不來時的情況。

二、《北遊集》裏說順治很愛讀《西廂記》，也很能欣賞金聖歎批本的《西廂》，那書是順治十三年（1656）刻的。《紅樓夢》第二十三回的回目已標出了《西廂記》，回內敘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送給黛玉看，「黛玉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頓飯功夫，將十六齣俱已看完」，這一段已可賅括其餘，像第四十回黛玉應酒令說「紗窗也沒有紅娘報」，引起了寶釵回頭看著他，和第四十二回寶釵的責備；還有第五十一回薛寶琴作的〈懷古詩〉裏的蒲東寺一首也用的是《西廂》，這些都不用饒舌了。四十二回裏寶釵也說她自己偷看《西廂》、《琵琶》。《北遊集》裏還記載順治問木陳道恣知不知道有南、北《西廂》的不同。⁴⁹

⁴⁵ 同上注，卷四，頁89。

⁴⁶ 〈行狀〉，頁六上。參看上文注32。

⁴⁷ 《北遊集》，卷四，頁84。

⁴⁸ 同上注，卷五，頁106。

⁴⁹ 同上注，卷三，頁62。

三、本篇前文提到過潘石禪先生曾懷疑《紅樓夢》第十九回襲人對寶玉說起寶玉常說的「除『明明德』外無書」，這裏暗藏著不忘明朝的含義。⁵⁰按十九回原文云：

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作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卻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麼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

現在我們知道這「除『明明德』外無書」的話，也許竟是順治說過的。在真樸編的《北遊集》裏，順治有兩處問木陳這句話何義：

〔順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命學士〕復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云：『明，明之也。』如何是明之底道理？」師云：「問取朱文公去。」士皆無語，上發笑。⁵¹

〔十七年庚子五月〕上一日手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拈起示師曰：「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云：「日輪正卓午。」⁵²

這裏木陳說的皆是禪宗所謂機鋒語。《紅樓夢》用它，成了寶玉的口頭禪，倒很合小說的要求，是這句話的活用。

四、順治能寫擘窠大字，他也曾跟木陳討論書法。陳援菴先生曾引《北遊集》載順治「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擘窠書一敬字，復起立連書數幅」。⁵³ 其他的地方也有記順治皇帝寫大字的，我們就不多提了。《紅樓夢》第八回賈府七個管事的頭目從賬房裏出來，一見了寶玉，趕來都一齊垂手站著。眾人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多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說：「不值什麼，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過了大半天到晚上他回到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說：「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了筆就走了。」臨走時寶玉吩咐過晴雯把那三個字貼在門斗上，晴雯還怕別人貼歪了，就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這寫的三個字是絳芸軒。

五、《紅樓夢》裏有一個陪襯的角色李嫫嫫，她是寶玉的奶媽。書中第八回既寫她在薛姨媽家裏攔住寶玉的酒興，不讓他喝酒嗜「鵝掌鴨信〔腎〕」；又攜去了寶玉替晴雯留的豆腐皮包子「給我孫孫吃」；又喝光了早上寶玉沏的要三、四次才出色的楓露茶；第十九回她又吃掉寶玉替襲人留的酥酪，寫來真是有聲有色。這李嫫嫫確是個真實人物。《湯若望傳》裏說順治十六年（1659）南京被鄭成功的兵圍困時，順治皇帝初則害

⁵⁰ 《紅樓夢新解》，頁24。

⁵¹ 《北遊集》卷二〈奏對機緣〉，頁28。

⁵² 同上注，頁43。

⁵³ 〈湯若望與木陳忞〉，頁507；參看《北遊集》卷四〈奏對別記〉下，頁73-74。

怕想逃回滿洲，後來又發怒一定要親自出征。這位奶媽跑上前去勸他，他就恫嚇要把她用劍劈成碎塊。⁵⁴ 順治自己撰的〈端敬皇后行狀〉也說過董鄂妃「即至朕保母，往來晉接以禮，亦無敢慢」。⁵⁵ 這位李嫫嫫，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死了，《清實錄》有順治憫悼追懷她的文字，稱她做「乳母李氏」。⁵⁶

六、小說裏的寶玉的形象有極像順治皇帝的地方，其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他的頭髮。《紅樓夢》第三回描寫他時說：「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⁵⁷ 這樣的描繪，也可用第二十一回寶玉求史湘雲替他梳頭的文字做比較。我們再檢《清世祖實錄》、嘉業堂鈔本《清國史》和蔣良騏《東華錄》相應的地方試做比勘，就看到順治皇帝的頭髮和這裏的描寫確有虎賁中郎之似：

上生而頂中髮一縷聳起。（《清國史·大清世祖章皇帝本紀》卷一）⁵⁸

上誕生。視之，頂中髮一縷聳然高起，與別髮迥異。（《大清世祖實錄》卷一）⁵⁹

蔣氏《東華錄》卷四頂中髮兩句全同《實錄》，⁶⁰ 就不用鈔了。除了這個形象之外，寶玉頂上終日繫著一顆沈甸甸地刻著「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八個字的寶玉，這「仙壽恆昌」無疑地就是傳統的皇帝玉璽上面刻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字的變相。⁶¹

《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說寶玉「一落胎胞嘴裏即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皇帝照傳統的舊說法自然是天命的，玉璽是他的威權的象徵，這不是胎裏帶來的麼？⁶²

⁵⁴ 《湯若望傳》，第二冊，頁290。

⁵⁵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行狀〉，頁四上。

⁵⁶ 《清世祖實錄》，卷一百四十三，頁十六下至十七上。

⁵⁷ 有正戚本，卷一，第三回，頁十七上至十七下。

⁵⁸ 《清國史》，嘉業堂鈔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3年），卷一，頁68。

⁵⁹ 頁二下。

⁶⁰ 蔣良騏：《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四，頁58-59。

⁶¹ 關於玉璽上面的這些字眼，可看《三國志》卷四十六〈孫堅傳〉引《吳書》、《魏書》卷四下〈世祖本紀下〉太平真君七年（446），以及《北齊書》卷三十八〈辛術傳〉的這些記錄。

⁶² 寒齋書少，草本文時嘗荷香港大學單周堯先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耀椿先生屢為賜寄影印所需材料，深為感激。

Baoyu and the Shunzhi Emperor

(A Summary)

Liu Ts'un-yan

The history and background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ovel *Honglou meng*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or *The Story of the Stone*) has been a very popular subject in the scholarly world since it was set in movable-type printing by Cheng Weiyuan and Gao E in 1791–1792, all together i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chapters. In late Qing and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it was gradually discovered, however, that even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eng–Gao edition there had been a number of transcribed copies, in eighty chapters only, being circulated among close friends and relations in some semi-aristocratic households, each of which bears a number of marginal commentaries signed under a pen-name Zhiyan zhai ([Master of] the Studio of the Red Inkstone) or using a similar pseudonym. The study of the novel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unlike the trifling and brief remarks contributed by a host of Qing scholars found in their leisurely jottings or in their own commentaries added to the reprinted new editions of the work) has sparked a number of serious contests among modern scholars even up to the present time. Some earlier scholars (led by Cai Yuanpei [1868–1940] and echoed later by Pan Chonggui and others) stick to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views maintaining that the novel bears remarks reminiscent of the longing for the lost Ming dynasty, containing also some anti-Manchu feelings of the ethnic Han-Chinese hidden in between the lines. The others (advocated by Hu Shi [Hu Shih, 1891–1962] and followed by many others) are more inclined to utilize the autobiographical materials scattered in the same work to strengthen the importance of Cao Xueqin (1724–1763), his undisputed yet sometimes ambiguous authorship, and his prestigious family background to the creation of such a gigantic literary work.

The present writer stands somewhere between the advocations of these two Schools. He does not belie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view them as being antagonistic. Although he accepts several of the autobiographical findings gathered by Hu Shi, Zhou Ruchang and others, he has not completely refuted the hermeneutic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some parts of the book which he believes might have inherited from some remains of an old version which Cao Xueqin could have kept in his unfinished manuscript as an early and feeble structure while planning his creative work. Historically,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Shunzhi (r. 1644–1661), had himself a very moving and tragic romance with his beloved royal concubine Oši Donggo (1639–1660), originally wife (and widow) of his half-brother, the Hošoi Royal Prince Bombogor, who pined away at the age of twenty-two, the Chinese reckoning. Tonggo, the Manchu concubine whose clan name was unfortunately homophonous with that of a Han-Chinese courtesan, Dong Xiaowan (1625–1651), who lived in the South, was married to Mao Pijiang (Mao Xiang, 1611–1693), a distinguished literary figure. She either had met her mysterious and early death, or as Professor Chen Yinke (Chen Yinque, 1891–1969) suggests, might have been hijacked by some Manchu soldiers during the time of disturbances and simply disappeared. Rumours in the South give that Concubine Tonggo was in fact none other than th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Liu Ts'un-yan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famous courtesan who was later admitted into the harem and given a Manchu name. There are a few commentators of the novel who believe that the Tonggo/Dong Xiaowan story had, however, slipped into the plot of the novel and is reflected in the Baoyu/Daiyu tragedy. Proving impeccably the absurdity of the North- and -South Mixture, 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nevertheless cites a number of incidents depicted in the novel which match some of the contemporaneous historical accounts. They are found, for instance, in the *Qing History*, the *Qing Veritable Records* (*Qing shilu*), the miscellaneous writings included in the *Memoir* of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a German Jesuit priest who served at the court, the *yulu* and diary of the *Chan* (Zen) Master Muchen Daomin (1596–1674) to whom the emperor had shown unusual esteem, and a diary compiled by a Korean envoy Yi Myo who witnessed many events at that time. These accounts show very convincingly that in the novel, the male-protagonist Baoyu resembles very closely the image and the behaviour of the reigning emperor who had a high enthusiasm for the Han-Chinese cultur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